

性，拒絕在世界性的架構之內討論中國的本土問題。即使在那些優秀的學人之中，這兩個基本障礙的糾葛也常常使他們感到討論的力不從心；而更重要的是，當學界似是而非地把使用西方的方法還是使用本土的方法作為一個衡量標準的時候，那些真正具有生長潛能的思考便與簡單的模仿套用混為一談了。當學術界還沒有建立有效區分真問題與花俏時髦的判斷基準時，為了避免把問題糾纏在所謂西方和本土的對立這類毫無價值的爭論上，我們當務之急也許不在於理論體系的建構，而在於理論問題的提出。《學術思想評論》顯然在嘗試進行這樣的

工作，因為它聚焦於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問題點，試圖走出西方與本土思想史方法對立的怪圈。在此還要提及的一點是：9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的人文學者紛紛心儀社會科學的「硬」學科，而文學出身的主編賀照田卻在這份綜合性刊物中給了文學研究相當多的篇幅，這為文學學科加入當今的跨學科思考並提供自身特有的資源創造了一個前提。

作為一本不斷展示各種發展潛能的雜誌，《學術思想評論》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我們期待着它進一步生長、拓展，在不斷揚棄取捨的同時完善自身，期待着我們擁有開放而互動的言語空間。

世紀之交的古典自由主義言路

● 止 水



《公共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95- ）。

在90年代的大陸思想界中，《公共論叢》被認為是自由主義一脈的代表之一。但據我看來，這麼說稍嫌籠統了一些。不同於人文學者們對胡適之先生的重新肯定，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懷，也異於經濟學者們從效率觀點對市場經濟所做的辯護。整體來看，《公共論叢》最鮮明的特色是自覺地堅持了

在90年代的大陸思想界中，《公共論叢》被認為是自由主義一脈的代表之一。僅就在中國大陸而言，它是中國人自己對古典自由主義第一次最為集中的闡述，這可以說是在世紀之交的中國開了風氣之先。

《公共論叢》的論題主要不是經濟領域的，但卻有大量篇幅討論市場經濟與市場社會。對個人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強調，是言說古典自由主義最基礎的工作。對財產權利的辯護，首要的是為了人類個體的尊嚴。

一條古典自由主義的言路。僅就在中國大陸而言，它是中國人自己對古典自由主義第一次最為集中的闡述，這可以說是在世紀之交的中國開了風氣之先的事。

《公共論叢》的特色，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是人類的價值理念和中國文化傳統方面；二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和多元體制的理論建構、政策主張方面。

因為有着價值的承當，《公共論叢》反對相對主義的泛濫，提出新的理想。不因為曾有的理想破滅，就說人間決沒有理想這回事。它從正面立論自由主義，尋求新的公共哲學的形成。《公共論叢》沒有從中西文化比較的、批評中國文化的立場提倡自由主義。不貶低中國的文化遺產，不低估中國人民的道德情感和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公共論叢》以極大篇幅致力於跨文化的溝通，闡發中國文化中固有的、豐富的、具有普適性的道德資源；探討在各個特殊的文化形式之下，承載了實質相同的價值理念。王焱〈陳寅恪政治史研究發微〉一文告訴我們，陳寅恪，中國文化的託命之人，如何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義的典範；陳氏對中國政治、文化史博大精深的研究，有助我們尋找中國固有的建設自由社會的制度與觀念遺產。在此，有一點似乎值得說說。傳統中國的毒瘤，乃是大一統的政治權力使一切依附於它這一結構性的問題，而非文化傳統本身。我們的文化傳統自有其超越性的一面，要緊的是能擺脫政治權力的束縛，使之能自行煥發生機。錢穆在《師

友雜憶》中說，中國社會之文化傳統、心理積習，實皆私塾奠其基；要使道統居於政統之上，教育權當操自社會下層，不當操自政府上層。

近來在西方盛行的社群主義也進入了《公共論叢》的視角。社群主義極端相對主義的結論，將價值的源頭僅歸結於某個社群，而否認人類社會存在普適性的價值，這是古典自由主義堅決反對的。這樣我們看到了劉小楓的專論〈自由主義，抑或文化民族主義的現代性？——對泰勒的現代性理論的若干疑慮〉。社群主義所期望的文化和社會的表現形態，往往也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期望的，但是對後者來說，這些良好的形態只能期於自發地形成，而不能在政治的、法律的層面進行建構。社區決不是制度建構的對象，合理的社群主義只能嚴格限制國家的權力。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是兩個問題，宜切記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話：「尋求過大的自由，只會帶來過大的奴役。」實際上，古典自由主義政治構架下的社會是有助於社區和社群意識的發展的。為甚麼社區會衰落，地方人民失去了自豪感和自助的能力？因為北京或華盛頓的權力太大了。

人類的價值理想如何實現，是同征服或統治如何可能的問題絕對相反的問題。後者對征服者或統治者來說是技術和戰略的問題。古典自由主義者正面應對這一自由社會的阿喀琉斯之踵的問題，探尋種種使自由成為可能的機制和背後的原理。

《公共論叢》的論題主要不是經濟領域的，但卻有大量篇幅討論市場經濟與市場社會。對個人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強調，是言說古典自由主義最基礎的工作，它要從一些最普通的觀念開始，使被毒化的語言回復它的本義。劉軍寧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政治理論視野中的財產權與人類文明〉就是如此。財產權利是實實在在的，普通的個人都能了解它，知道它的重要性。對它的辯護，首要的甚至不是因為物質福利，而是為了人類個體的尊嚴。只是在一些學者的空幻概念中，財產權利卻成了某種見不得人的事，甚至受到嚴重的詆毀和蔑視。直到現在，一些和實際生活隔離的人們，還貶之以「意識形態」或以沒有做到價值中立而不屑言此，甚或加以冷嘲熱諷。結果，人民群眾對自身財產權利的要求也不能理直氣壯，認識到其重要性的學者也只能以莫名其妙的詞——生產力來為它做間接和遮遮掩掩的辯護。現在就是要為個人的財產權利正名，以最完滿、最激昂的道義感支持它，使它獲得一種崇高的道德力量。完全從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觀點論證經濟自由主義，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主義是帶着深切的道德關注，帶着強烈的倫理意味的。而且，一個完善的私人財產權利的法律體系的運轉，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普通人的尊嚴和福利要求，和平地解決了社會秩序的有序運轉，制約了暴虐的政治權力。它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一個人道、自由的社會是如何可能的

問題。這包含了幾代思想大師對於社會秩序之性質的洞見。所以對財產權利的捍衛，不僅是出於道德的勇氣，也是出於理智的勇氣。

古典自由主義者不僅僅從效率這一點來談論經濟自由，經濟自由主義是他們規範政治理論的一個部分。僅有經濟自由主義不足以構成一個完整的自由社會可能性的理論框架，所以還有在市場經濟之外的政治建構的重要性。古典自由主義關於政治經濟建制的原則，可溯源於一個深厚的政治哲學傳統，在柏林 (Isaiah Berlin) 兩種自由概念的辨析，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對國家行動範圍的勘定，休謨 (David Hume) 關於可能的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政治哲學原理，貢斯當 (Benjamin Constant) 對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的比較中 (皆載於《公共論叢》)，我們可見到歷代思想大師的洞見。它更是建立在系統的經濟哲學和社會哲學的基礎之上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家，以他們的成果，為我們研究使一個自由的社會可能的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有力分析工具。張辰龍的〈在自由與民主之間保持張力——保守主義經濟學家的民主理論〉只是讓我們見其一斑罷了。對於其更進一步的思想基礎，在現代以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為集大成者，汪丁丁的文章〈哈耶克「擴展秩序」思想初論〉上中下三篇提供了這方面的視角。有了對自由社會可能性知識的充分了解，始能在紮實的基礎上提出切實的理想，而不走向狂熱或虛無。

古典自由主義者不僅僅從效率這一點來談論經濟自由，經濟自由主義是他們規範政治理論的一個部分。僅有經濟自由主義不足以構成一個完整的自由社會可能性的理論框架，所以還有在市場經濟之外的政治建構的重要性。

個人私見，古典自由主義可說是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建構主義兼有。文化保守主義是個人態度的，不是政治的，是非建構性的，是關於私立學校講授內容的，是關於教堂和家庭的；政治的建構主義，首先是劃定人類社會中可建構的領

域，是確立個人為基礎的財產權利的，是憲政的，立憲保證的司法獨立和競爭性聯邦主義的，是法律保證權力和權利的分立的。《公共論叢》在這兩個方面的言路，對當下的中國，不能不說是有着特殊的意義。

在學問與思想之間

● 龔 雋

《開放時代》這本屬於體制內運作的刊物，卻由於近兩年的艱辛創新、「擁抱異類」而終於碩果僅存地成為前沿思想界不能不關注的一家雜誌。這得惠於其民間化的思想立場和言說方式。



《開放時代》(廣州：開放時代雜誌社，1989-)。

在那些體制內的學刊多少有些沒落得只剩下一些象徵性的意味，而大體可以為圈內學者們視而不見

時，《開放時代》這本屬於體制內運作的刊物，卻由於近兩年的艱辛創新、「擁抱異類」而終於碩果僅存地成為前沿思想界不能不關注的一家雜誌。這得惠於其民間化的思想立場和言說方式。

《開放時代》不是一本同仁性很強的刊物，卻有它相當明確的話語立場，可以說，它是同情於啟蒙路線和自由主義的。就自由主義對於社會的關心和興趣來說，它主要還是一種格里德 (Jerome B. Grieder) 指出的「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和「一種引導公共生活的方式」，因而它並不太學究氣地超然於「現實」之外，不問世事而「回到故紙堆中去」。《開放時代》1999年5、6月號所刊徐友漁那篇具有宣言性質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一文，明確把9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對80年代啟蒙思潮和人道主義的接續關係顯現出來，並公開表